



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政重慶以來，相繼推出「打造內陸開放高地」、「五個重慶建設」、「民生十條」發展戰略，備受海內外關注，被外界譽為「重慶模式」，其核心為以民生促發展，兼顧公平與效率。在市委三屆九次全會召開之前，重慶廣邀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齊聚山城，深入探討如何縮小城鄉、區域、貧富「三個差距」，以最終實現「共同富裕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

## 共富之路 重慶前行

■重慶在中國率先提出縮小「三大差距」，實現共同富裕。



王偉光（中國社科院副院長）：

### 應站在中國全局層面探索共富道路

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基本原则，是鄧小平提出的第二個戰略性問題。鄧小平要求，中國應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解決共同富裕。十年過去了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，「如何實現共同富裕」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急迫地擺在全黨與全國人民面前。

解決好共同富裕的問題，有助於中國應對來自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。目前重慶的貧富差距正在縮小，而且決心將基尼系數降到0.35，城鄉收入比要降到1:2.5，該市在解決分配問題上開了好頭。但就中國而言，全盤解決好分配差距問題的途徑還未找到。重慶的經驗非常值得關注和總結，我們必須站在全國層面思考如何解決共同富裕。



紀寶成（中國人民大學校長）：

### 重慶將成共富典範與社會主義理論研究樣本

中國政府如何應對分配不公現狀？第一，重新認識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係；第二，公平與效率都是效率獲得的核心基礎；第三，共同富裕是新時期中國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工具性目標；第四，要對分配不公進行系統治理；第五，必須認識到收入分配改革已成為諸多改革的重點工程；第六，「共同富裕」並不是「均富」，而是要構建「先富帶動後富」的長效機制；第七，高度重視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發展，及時調整政策；第八，收入分配改革應樹立科學社會建設觀和可持續民生工程觀。

在共富路上，重慶已走在中國最前沿。「十大民生工程」、「五個重慶」等政策都緊緊把握住了「共同富裕」這個根本問題，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標識意義的新探索。我希望並堅信，重慶將成為中國「共同富裕」的典範和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的典型樣本。



劉國光（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）：

### 保持公有制經濟與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

重慶明確地提出，到2015年把基尼系數從0.42降到0.35，成為中國首個把縮小基尼系數寫入「十二五」發展規劃的城市，表明重慶在堅持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步前進的決心。

中國城鄉每日收入2美元以下的人口達10億，表明中國現在大部分國民確實不富，甚至很窮。改革開放以來，在一部分人「先富」後，大部分群眾未能「後富」，反而陷於相對貧困，這是內需不足的结果。此外，所有制結構和財產關係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，使財富積累迅速集中於少數私人，才是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。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，貧富差距就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。



# 海內外大家聚重慶 青梅煮酒論「共富」

張維為（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）：

### 重慶分「蛋糕」與做「蛋糕」 相輔相成具有示範效應



重慶百姓的居住條件多數優於香港百姓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重慶「民生十條」中公租房建設，此舉不僅能改善民生，也能吸引大量外資來渝落戶，這種民生實踐對中國兼顧做好「蛋糕」與分好「蛋糕」具有啟發性意義。

重慶實踐的特色可歸納為四點：第一，重慶發展質量高，除了其硬件發展水平在某些方面超過香港或歐洲外，軟件水平也很高。第二，重慶人民對民生導向的發展政策十分滿意，我遇到的出租車司機普遍給政府很高的評價。第三，重慶的實踐是做「蛋糕」和分「蛋糕」並重，改善民生的同時也改善投資環境，可促經濟發展。第四，重慶實踐打破了只有中國發達板塊才可能比西方做得好的常規思維，證明了西部的新興板塊可以做得更好。

夏興有（國防大學教育長、少將）：

### 重慶民生模式與價值體系構建體現科學發展觀



中國作為新世紀最大的發展中國家，要着重考慮民生問題、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問題、民主問題、生態問題四個基本問題，其中，國家應該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最優先解決的位置上。

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中，重慶實踐正全面推進：一是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方式；二是以重塑社會精神為主要內容的價值體系構建。這兩條是重慶模式的要旨所在，是科學發展觀的體現，為探索中國社會全面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樣本。

我認為，中國想要實現共同富裕，需要以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作為基本前提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、人民民主專政與四項基本原則，還要構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。

胡鞍鋼（清華大學教授）：

### 2020年中國人均GDP將達中等發達國家水平



目前，中國各地區人均GDP水平呈現「一個中國、四個世界」現象，但總體趨勢是從第四世界向第三世界、第二世界不斷轉移；中國地區人均GDP差距系數經歷縮小（1978-1990）、再擴大（1990-2004）、再縮小（2004-2010）的過程。

出現多個「世界」原因歸為三點：一是初期差距效應，即發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發展起點不同；二是增長速度累計效應，即使不同國家或地區增長率很小，差異會給收入水平帶來驚人的影響；三是投資於人力資本、社會資本、無形資本的收益大大高於投資於自然資源開發、物質資本和有形資本的收益，在中國不同地區之間，投資模式大不相同，沿海發達地區對於人力資本的投資要顯著高於中西部內陸地區。

我認為，中國將繼續縮小與美國人均GDP差距，人均GDP差距將持續下降，到2020年，達到發達國家或者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。

李慎明（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）：

### 共同富裕與所有制形式不能脫鉤



重慶率先提出縮小三個差距，並將其列入城市「十二五」發展規劃，這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與示範意義，對於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、防禦西方顏色革命，確保黨和政權永不變質，確保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。

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「橋」和「船」，是實行以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的依法治國方略，並堅持公有制的體地位。共同富裕與所有制不能脫鉤，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，才能在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，否則，共同富裕就是「烏托邦」。具體而言，要在農村發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制；明確資源的產權，防止資源流失，確保群眾共享資源的收益。

崔之元（清華大學教授）：

### 應鼓勵員工持股 增加工人財產性收入



無論是重慶國資補貼微型企業的創辦，還是降低民營企業的所得稅，重慶通過國有資產增值後藏富於民，遵循的是國民共進的思路，具有示範作用。

在職工持股方面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，應該比美國做得更好。重慶國企應該通過企業職工持股和建立企業年金，增加職工的財產性收入，這是在國資系統解決好分配問題的有效辦法之一。具體而言，重慶應當突破企業上市的股東人數限制，保護持股職工因股票增值獲得的財產收入。

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的規定，我國已經明確提出企業年金，不論在國有企業還是在民營企業，通過企業年金的方式，鼓勵職工持股，使得勞動者不單純出賣勞動力，更能獲得其他的財產性收入，重慶可以在這方面進行些探索。

辛旗（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）：

### 應將重慶模式由經驗做法上升為理論高度



我對重慶實踐經驗有三點評價：第一，重慶體現了中國各地區差異性大的特點，是大中國的縮影，所以極具普遍意義；第二，重慶的實踐，不僅對西南地區發展產生輻射性影響，而且對中國政治、文化、社會、道德等領域也產生了相當影響；第三，重慶的經驗證明，在社會發展過程中，引導民意的重要性，所以，政治上要強調「江山意識」，摒棄「舞台意識」，要將重慶模式由經驗做法上升為理論的高度，促進中國執政黨增強自身執政能力。

重慶模式普遍性的發揮告訴我們，中共可以根據地域特色，不斷推陳出新。一個政治集團、政黨和政治家，應該以思想理念治國，而不是技術治國和工具理性治國。

紀碩鳴（《亞洲週刊》資深特派員）：

### 重慶探索是物質與精神的共同富裕



物質基礎上的共同富裕與物質和精神的共同富裕，是共同富裕的兩個內涵。重慶在一個理論真空和價值觀廢墟的環境下脫穎而出，成為了世界關注的焦點。「統籌」是重慶的指導思想，因為重慶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注重平衡各方的關係。第一，重慶不是簡單模仿沿海地區的「兩頭在外」的外向型經濟的模式，而是考慮怎麼揚長避短。第二，重慶強調政府的財政收入的增長和藏富於民，齊頭並進，實際上已經是一種共同富裕的指導思想。第三，重慶通過「唱紅打黑」，樹立了社會主義的正氣。第四，創新工作模式，既動用政府的力量，又發動社會力量改革社會難題，有效的吸納民營企業參與留守兒童學校建設。第五，重慶通過「結窮親」等活動，弘揚共產黨一貫倡導的價值，並且在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有所創新。

趙啟正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）：

### 重慶模式應時代召喚而生



中國改革開放30年，形成不同的里程碑，分別是深圳、浦東、濱海與重慶。重慶的崛起，具有時代性與創新性，對其他地方的發展有更長遠的啟示意義。

重慶模式與深圳、浦東、濱海不同：第一，重慶模式是全新的。以前的三個模式有若干雷同，浦東中有深圳的影子，深圳中有浦東的影子。第二，重慶不具備很多優勢。這裡是山高溝深，開發難度很大。

當前抱怨文化蔓延得很厲害，社會需要新的空氣，新的光芒，新的希望，新的解決辦法。重慶模式應時代的召喚而誕生，時代造就重慶模式。重慶改革開放的先鋒性作用，必將貢獻於全國，對此我抱有一種信念和期望。